

# 第一章 引言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2月4日，国务院正式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对之后5年的乡村振兴进行了具体部署，乡村振兴战略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其中的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对推动整体战略实施意义重大。战略规划中对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提出了具体要求，即“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载体，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建设邻里守望、诚信重礼、勤俭节约的文明乡村”。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至此,乡村振兴战略和媒体融合战略在乡村交汇,让媒体助推乡村振兴的主旨更加明确,也让媒介与乡村社会研究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乡村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最末端,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薄弱环节之一,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之一。传播与治理具有天然联系,乡村传播也相应地成为推动乡村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力量、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从上述重大时代背景和现实意义上来讲,对媒介与乡村社会发展的研究,尤其是从历史维度深入探讨乡村媒介空间的结构转型问题,将有助于廓清乡村传播的历史脉络和基本规律,从传播学的视角为乡村治理乃至乡村振兴贡献理论思考,提供一些有参考价值的传播策略。

媒介作为人与人之间信息传播的载体,在满足人们信息往来和需求的同时,建构了复杂的传播关系和鲜活的传播场景,即媒介空间。媒介空间内嵌于社会生活中,既是人们形成传播关系、建立社会交往的场域,也作为内隐的传播制度规制着人们的传播活动。乡村日常文化生活零乱、琐碎,看似没有明确的主线,难寻其规律。然而,如果将媒介空间作为我们审视乡村文化生活的突破口,会发现乡村媒介空间的结构变化可以小见大,映射出乡村社会的变迁。为此,可以尝试从媒介空间的视角,进入历史语境与日常生活场景,考察乡村媒介空间的变化。这样可以避免在以往媒介与乡村社会变迁的相关研究中,过度聚焦于媒介,尤其是现代媒介对乡村社会变迁的线性影响,从而遮蔽了乡村传播关系的复杂性。因此,本研究在焕新媒介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视角之外,还试图通

过对乡村媒介空间变革的历史考察，纠正以往将空间与媒介割裂的认知和研究倾向，尝试探讨媒介空间研究的社会意义和理论价值。

在淤泥水调查时碰巧赶上村里庙会，庙会上的民间信仰仪式貌似一如既往，但庙会上的文化活动已经变了样。戏台上看不到传统的秦腔戏，律动着时尚节拍的舞蹈队成了戏台的主角。舞蹈演员她们着装统一、训练有素，跳着时下城里最流行的广场舞。台上舞者跳得起劲，台下观众看得欢喜。

与台下村民搭讪，问及为何会有这种变化？他们介绍说以前村里过庙会都是请县秦剧团演秦腔戏，花钱多少不说，没人爱看。现在村里有了自己的舞蹈队免费为庙会演出，村里人觉得洋气热闹。由此推开，聊到了村民文化生活的变化。比如以前晚饭过后，村里妇女多待在家里看电视，现在一到晚上就急着去跳舞；以前村里打麻将都约在私人家中，现在主要去村里的文化活动室。乡村文化生活的变化不单体现在文化媒介的变化上，还体现在文化活动空间的变化上，这种变化既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也演绎出媒介空间变革从观念和行为层面对乡村社会所具有的结构性影响与意义。这些媒介空间变化的点点滴滴汇聚在一起，描绘出乡村文化生活与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从这个角度出发，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乡村媒介空间如何转型，就成了一个颇有意义和价值的课题。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随着现代传播媒介在乡村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媒介与乡村社会”不但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成为传播学本土化的

一种有益尝试。目前虽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一些研究难以摆脱对西方研究的移植或模仿。尽管西方理论有借鉴价值，但立足中国的现实，以历史与社会交叉的视角来重新构建研究框架和理论逻辑才是重点所在。

## 一、以往研究的路径探寻

目前，“媒介与乡村社会”研究大体沿着两条路径展开，即发展传播学与社会—人类学。从发展传播学的学术传统来看，基本上有两个理论流派，一个是现代化理论，主要关注近代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还有一个是发展理论，主要关注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进步与发展。<sup>1</sup>现代化理论的着眼点在于把现代媒介看作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因。如丹尼尔·勒纳教授对中东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就是基于对土耳其等6个中东国家的社会调查，从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阶段的相互关系中说明传播媒介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sup>2</sup>施拉姆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进行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研究，也是集中分析了大众传媒在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sup>3</sup>罗杰斯则具体关注创新与发明如何在农村中进行传播与扩散、普及与推广。<sup>4</sup>Chatterjee重点分析了广播对于印度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sup>5</sup>Bauer从美国大众媒介与大众社会的关系角度，审视了大众媒介的社会影响。这些研究都是

---

1 尤游：《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在农村社区的角色分析——关于湘中三甲村的个案阐释》，7页，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研究生院，2006。

2 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Free Press, 1958.

3 [美] 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金燕宁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 [美] 埃弗雷特·M. 罗杰斯：《创新的扩散》，关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5 Chatterjee.P.C. *Broadcasting in India*.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87.

将传播媒介置于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考察的。<sup>1</sup>

如果单从媒介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理论有诸多重合之处，不管研究对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在西方的现代化语境下进行研究的，其中，大众传播媒介推动社会走向现代化，这一点构成研究的既定目标。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的区别在于，是否借大众传播媒介系统来研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传播格局中的不平等关系。由于在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的研究中，现代化理论对大众传播媒介作用的过度强调，此类研究往往陷入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的线性关联之中。在此背景下，发展理论开始将视野向外扩展，通过内外对比，重新审视发展中国家的传播现状，并将国际传播格局与秩序确定为新的研究内容。例如赫伯特·席勒的“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就致力于探讨全球传播格局中的依附关系及其根源，<sup>2</sup>由此形成了传播研究的依附范式。

“二战”以后，发展传播学的缺陷逐渐被认识和强调，如秉持进化论立场，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以及现代与传统的二元视角等。韩鸿指出，20世纪70年代，拉美传播学者倡议摆脱依附，立足本国实际，进而创立本土理论与方法的呼声，逐渐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得到积极回应，由此形成了新的研究路径，即参与式传播<sup>3</sup>。该研究路径注重对个人主体性的发现和挖掘，对个人自信与自尊的满足以及对个人独立思考与判断力的强调，试图通过对个人主体性的凸显，来摆脱对西方的研究依赖。近年来，国外知名学者赵月枝以及国内学者郭建斌、孙信茹、李红艳、

---

1 Bauer, R.A, A.Bauer. America Mass Society and Mass Media.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60 (3): 3 ~ 66.

2 赫伯特·席勒：《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刘晓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 韩鸿：《参与式传播：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换及其中国价值——一种基于媒介传播偏向的研究》，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1），40～49页。

沙垚等，立足乡村民众的鲜活实践，在乡村传播研究中突出农民的主体性，并由此开启了我国乡村传播研究的逻辑重构和理论创新之路。

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在我国早有实践，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乡村社会学。早在 20 世纪初就已经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如库尔普对华南农村生活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以及费孝通和梁漱溟对乡村经济社会的系统研究等。乡村社会研究由于立足日常生活之细节，试图以小见大，折射出社会关系之变化。这一思路在社会史研究中也有类似趋势，包括搜集细致入微的生活细节资料，还原地方社会历史原貌等，如李长莉对近代上海人各种生活状态的考察研究。

与此同时，人类学的研究思维也在发生转变。原先倾向于将研究对象确定为封闭保守的偏远村落，现在却由于全球化，再难有置身世外的社区。各地方相互连通，相互影响，处于复杂的交流沟通和关系网络之中。<sup>1</sup> 因此，社会学与人类学在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中发生了交叉与重合，在相互借鉴融合中形成了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路径。

上述各种研究路径都服务于具体的研究问题，皆有其可取之处，不必拘泥于方法与路径的分隔，关键是立足中国的现实问题，不能因对研究路径的依赖而受困于西方的问题指向与理论框架。

## 二、媒介与乡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一）国外研究

国外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导向，即专题导向与问题导向。专题导向强调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待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的关系，通

---

1 [美]柯克·约翰逊：《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展明辉、张金玺译，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过对社会各方面的考察来衡量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和影响。比较典型的研究有柯克·约翰逊对印度两个偏僻乡村的民族志研究，该研究探求了“电视对社会性别、种姓制度和家庭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村民的志向、前程和关切什么？电视是怎样冲击他们的？村民认为电视在该地区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sup>1</sup>等一系列问题。研究旨在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深入分析电视在乡村社会发展与村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问题导向着重就某个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如 Moraru 曾对信息传播与受众需求的错位问题进行了研究<sup>2</sup>，Aufderheide 研究了录像在印第安部落形成政治联盟过程中发挥的作用<sup>3</sup>，Chandrasekhar, P 考察了无线电广播对印度社区发展变革的作用<sup>4</sup>。此类研究均表现出很强的应用性。

此外，一些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中，也会涉及乡村社会的传播问题。如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一书中，谈及村民公共生活时，以农村有线广播为例，论述了村民在每天收听广播节目的过程中，形成了对有线广播的依赖。这也给村民的公共生活“无可避免地打上了国家干预的烙印”。<sup>5</sup>

---

1 〔美〕柯克·约翰逊：《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展明辉、张金玺译，1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 Moraru, Mădălina. The Contemporary Profile of the Romanian Peasant Portrayed in the “Village Antenna” Radio Station Programs. *Styles of Communication*, 2010 (2): 100~114.

3 Aufderheide. pat. You See the World of the other and You Look at Your Own: The Evolution of the Video in the Village Project. *Journal of Film & Video*, 2008, 60 (2): 26 ~ 34.

4 Chandrasekhar, P. A Study of Community Radio in Andhra Pradesh. *Global Media Journal: Indian Edition*, 2010 (31): 1 ~ 31.

5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4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并且,他认为,在电视和其他大众媒体普及的情况下,村庄公共生活逐渐萎缩,“村民们只好待在家里打发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也正因为如此,家庭、家属关系、社会关系网络等就变得更加重要”。<sup>1</sup> 阎云翔还对人与人关系互动的特殊媒介——礼物,进行了专题性的探讨。他在《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中,重点研究了乡村社会的礼物交换体系和人际关系,并以此作为“理解和诠释既定社会中不同文化规则及社会关系结构的途径”。<sup>2</sup> 通过对下岫村的实地调查以及对国外相关研究的梳理讨论,他认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礼物馈赠见于世界各地。然而,它所采取的形式则依据文化母体的不同而不同。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对中国文化在礼物世界中位置的勾勒和诠释。”<sup>3</sup> 乡村社会传播存在控制与被控制的不平等关系,莫里斯·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中,通过对祖先灵牌在宗祠中的安排进行研究,认为“死者和后人的社会地位改变了谱系原则的安排”。<sup>4</sup> 灵牌作为连接先人与后代的媒介,其安排或摆放受到了现实社会规则的影响和制约,它实际上反映了乡村社会中宗族精英的话语权与仪式控制。有控制就会有反控制,农民在面对乡村权威时,有自己的反抗方式。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对农民反抗乡村权威的“日常”形式进行了分析,认为:“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

---

1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42~43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2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21~2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 [英]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10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日常武器，“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sup>1</sup> 研究者认为这种斗争形式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sup>2</sup> 这对弱者来说是最有意义和有效的。乡村社会的权力如何实施是乡村研究的重要问题。杜赞奇通过对华北平原村庄的历史考察，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sup>3</sup>，涵盖“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相互关系网。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诸如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了施展权力和权威的基础”。<sup>4</sup> 谣言或闲话在乡村社会是一种普遍的传播现象。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尽管主要关注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但也堪称传统社会谣言传播研究的经典之作。该书主要就“叫魂”这一妖术如何在数省范围内引起恐慌，进行了抽丝剥茧、条分缕析的论述。谣言如何扩散蔓延，在书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从中也能看出谣言快速传播背后的社会心理。乡村社会的传播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明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中，从乡村结构、乡村道路、乡村水井、乡村戏剧、乡村商店、乡村新年等方面，对中国乡村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景扫描，从中能清晰看出乡村社会的信息传播状况。

## （二）国内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媒介与乡村社会的研究主题作为传播学本土化

---

1 〔美〕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2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2 〔美〕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2~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3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民译，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4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民译，4~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的一种尝试得以出现,最初是一些受众调查,如杨云胜与程世寿在湖北襄阳做的农村读者调查;祝建华在上海郊区做的农村传播网络调查等。<sup>1</sup> 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该问题的认识逐渐转向了理论思考,如裘正义以“发展传播学”为理论指导,着重探讨了大众传播媒介如何推动乡村社会的发展,<sup>2</sup>这推动了传播学本土化的理论实践。其后的研究中对西方理论的重视,也造成了一种注脚型的研究套路,主要是用中国的现实验证西方的理论,这种做法在当时起到了加强研究的理论性,提高研究的规范性等作用,但也让后来的研究形成了对西方理论的过度依赖。

新媒介在农村推广普及以后,对媒介与乡村社会的研究出现了两种不同取向,一种主要以宏观视角来考察媒介与农村社会发展。如方晓红教授进行的“苏南农村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sup>3</sup>研究。该研究以大量翔实的调查材料和数据证明:“大众传播媒介是江苏农村现代性增长的推进器。”<sup>4</sup>同时,她认为,“信息的效益不是永恒的,观念的变革才具有长效性”。<sup>5</sup>此外,还有张国良关于“新媒介与扶贫”的研究等。另一种取向则注重对微观社会的深描,将研究范围缩小为某一种媒介如电视、广播,乡村社会也缩小为乡村社区,即一个村落或社区。从此类研究的整体现状来看,媒介与乡村社会的研究并不平衡,一些媒介被重视,一些媒介被忽略。<sup>6</sup>如郭建斌教授博士论文,就是通过田野

---

1 郭建斌:《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6页,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研究生院,2003。

2 裘正义:《大众传播与中国乡村发展》,3页,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研究院,1991。

3 方晓红:《大众传媒与农村》,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

4 方晓红:《大众传媒与农村》,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

5 同上。

6 戴维·巴勃特:《媒介社会学》,赵伯英、孟春译,1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调查对独龙族人日常生活中的电视使用情况进行深描，通过鲜活的生活场景展现媒介对村民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研究者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即“中国社会转型期大众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地区所扮演的角色”。<sup>1</sup>此论文开风气之先，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开始为传播学所用，尤其是在媒介与乡村社会的研究领域运用最多，由此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如李春霞的博士论文《电视与中国彝民生活》，主要研究电视是如何进入彝民生活，并被理解、接受和消费的。研究将这一论题纳入仪式分析的框架之中，试图还原彝族村民的媒介生活，并从细致入微的生活片段中，爬梳电视与受众的相互关系。<sup>2</sup>金玉萍的博士学位论文《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电视使用——托台村维吾尔族受众研究》，主要考察了电视对维吾尔族村民日常生活的重构，并试图找寻其实践规律。<sup>3</sup>可以看出上述研究都将媒介还原于村民的日常生活，通过村民的媒介使用，以小见大，折射出媒介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这种研究思路在媒介与乡村社会研究中非常实用且普遍。

新媒体兴起以后，关注新媒体对乡村社会和乡村民众的影响成为乡村传播研究的又一方向。其中，最多的是新媒体进入乡村的过程研究，学者们将其视为乡村的信息化进程，并展开了多角度的问题研究和对策研究。叶明睿借助认同理论对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人际扩散进行了研究，认为“家庭子女和本地教师对互联网的人际扩散具有显著影响，外出务

---

1 郭建斌：《传媒与乡村社会：中国大陆 20 年研究的回顾、评价与思考》，载《现代传播》，2003（3），44～47页。

2 李春霞：《电视与中国彝族生活——对一个彝族社区电视与生活关系的跨学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研究生院，2005。

3 金玉萍：《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电视使用——托台村维吾尔族爱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研究生院，2010。

工者和有关商家对普及互联网知识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而乡村干部及农业示范户对互联网的人际扩散影响较小。”<sup>1</sup>周海英认为“乡村网络信息入户是推进乡村信息网络建设的关键。利用有线电视、手机终端与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结合等间接手段把网络信息送到农户手中是现阶段切实可行的方式和途径。”<sup>2</sup>

新媒体作为乡村信息化的“利器”，在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得到肯定的同时，也为诸多学者寻求乡村社会治理新路径提供了可能。牛耀红针对乡村社会化“离散化”的现状，研究认为微信群成为乡村社会新型公共空间，它“实现了‘离散化’村庄的再次聚合，将‘半熟人社会’转变为‘熟人社会’。”<sup>3</sup>陈绚、董书华认为农村在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去集体化”和“原子化”，建议“在乡村引进参与式传播，发展草根媒介促进乡村社区建设。”<sup>4</sup>孙信茹通过对云南普米族乡村一群年轻人的微信使用和微信群活动的民族志考察，认为“借助微信，个体在生活空间与网络虚拟空间之间可以自由转换，其乡村个体意识与族群信念得以交织融合；村民在村落内部和村落外部实现更为紧密和多元的互动。”<sup>5</sup>

国内社会学和人类学关于乡村社会的研究也部分涉及与媒介相关的

---

1 叶明睿：《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人际扩散：基于认同理论的实证研究》，载《当代传播》，2015（7），87～89页。

2 周海英：《新媒体在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的可行模式研究：以湘西自治州为例》，载《新闻界》，2010（9），76～77页。

3 牛耀红：《在场与互训：微信群与乡村秩序维系：基于一个西部农村的考察》，载《新闻界》，2017（8），2～9页。

4 陈绚、董书华：《乡村居民媒介使用调查报告：2012年1月～2月河北第什营村实证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12（5），70～80页。

5 孙信茹：《微信的“书写”与“勾连”：对一个普米族村民微信群的考察》，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10），6～24页。

主题。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村落社群的语言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相同生活环境、生活经历形成了统一的意义体系。“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群体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经验愈繁杂，发生语言的一层共同的基础也必然愈有限，于是语言也愈趋于简单化。”<sup>1</sup>同时，他还对存在于熟人中的行话进行了分析，最终认为“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sup>2</sup>黄树民在《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中对村民利用乡村广播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发现村民多注意来自广播的生活实用信息，而不关注政令宣传。这种传播方式只要求“村民接受这些指令和讯息，并照着去做，而不是要问他们有何意见”。<sup>3</sup>贺雪峰在对乡村社会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就人际传播提出了两种类型的关系：一种是传统关系，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如亲属关系、朋友关系等；另一种是现代关系，以契约与利益为基础，如买卖关系等。<sup>4</sup>此外，他还就乡村社会中的人情观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张乐天在《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中也对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社会交往进行分类，予以阐述和说明，大体上分为亲戚交往、邻里交往、朋友交往以及市场交往。<sup>5</sup>乡村社会的传播现象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很多研究中都有涉及，这为媒介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

1 费孝通：《乡土中国》，16～17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2 费孝通：《乡土中国》，18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3 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素兰、纳日碧力戈译，14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4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30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三、对新时代媒介与乡村社会研究的思考

多数乡村传播研究遵循了“以媒介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注重从宏观视角考量媒介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或媒介如何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变迁。在该研究范式中，人是集合概念被社会所取代，人是被动的存在，人的媒介实践成为对媒介的被动响应。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对乡村的界定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繁荣发展乡村文化至关重要，而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激活乡村民众的文化主体性和创造性，同时加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乡村公共文化传播体系建设。这对乡村传播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强调了“以人为中心”的乡村传播研究范式。在媒介与社会的复杂互动场域中，人的主体性、创造性渗透其中，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于是，通过提出和建立“媒介空间”的概念，容纳人、媒介、空间的复杂互动并形成新的阐释框架和审视媒介与乡村社会关系的维度，成为“以人为中心”研究范式的新思考。从“媒介空间”的概念和逻辑出发，“以人为中心”的乡村传播研究范式主要从两条逻辑路径展开，一条是以“服务于民”的视角考察乡村公共文化传播体系建设，这主要是解析乡村社会空间如何实现媒介化；另一条是以人为中心考察乡村媒介的空间化实践，主要解析媒介如何通过人的主体性实践，成为乡村社会的结构化存在。

在当下的乡村传播研究中，媒介空间的概念和研究框架对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乡村传播研究范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一方面，可以摆

脱媒介效果论或媒介影响论的逻辑，避免将媒介作为单独的直接变量进行考察，强调将媒介作为中介或结构化机制，协同和连接多种因素进行社会关系建构。另一方面，将媒介还原于场景，还原于生活，还原于文化，还原于社会，从鲜活生动、纷繁复杂的媒介实践中发现人的主体性，探究人主体性形成的媒介机制。

此外，在乡村传播研究中还需要警惕被“城市中心主义”所裹挟。以往，多数乡村传播研究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等同为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使得乡村传播研究延续城市传播研究的价值逻辑。其中一个较为典型的情况是将媒介视为城市与现代的象征，只看到了外生性媒介对乡村社会的改变，没有顾及乡村社会对外生性媒介的本地化改造，也没有顾及内生性媒介的创新发展给乡村社会带来的重要变化。这些被忽视的部分恰恰是乡村传播研究今后需要进一步开拓和深挖的领地。

### 第三节 研究问题与突破口

“媒介与乡村社会”是传播学本土化的重要研究方向，在相关研究中，总是难以避开乡村社会现代化的主题，一些研究是通过勾连媒介发展与乡村社会变化的线性关系来呈现的，这种认识存在一定偏狭，它潜在的指向是刻意突出媒介对乡村社会变迁的直接影响，回避了媒介的结构化特质和媒介与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于乡村社会的复杂生态。本研究并未沿用过往思路，而是引入媒介空间的概念以容纳媒介结构化特质和包括媒介在内的复杂因素，从而形成媒介空间的阐释框架，将乡村社会的变迁具象化为媒介空间的变化，将媒介空间视为一

个历时态发展的连续体，在历史的脉络中重新认识和理解媒介与社会的复杂互动。同时通过对乡村媒介空间深描和阐释，从细部发现和揭示媒介与社会空间的形构关系，进一步考察媒介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微观机制。

虽然空间早已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关键领域，但对于传播学而言却仍处于相对边缘的地带。在社会学看来，空间绝不仅仅是有形的实体空间，更是指社会关系空间，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空间形态，比如戈夫曼的情境论将空间视为一种情境。按此理解，媒介及其传播活动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空间之中，不管是有形的实体空间还是无形的社会空间，而且媒介及其传播活动本身也在建构或塑造着空间。比如“灵媒”存在于村庙空间并建构出民间信仰空间，“人情”存在于婚丧嫁娶等特定的日常生活空间并建构出独特的“人情”交往空间。与此同时，这些再造空间也在强化媒介存在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在乡村传播的研究中，没有必要人为地将某种传播形态或媒介分离出相应的媒介空间，重要的是将这种传播形态或媒介还原于相应的空间中去理解，并对其进行情景式的考察，理清其构建的复杂社会关系脉络。此外，乡村社会中的传播形态或媒介也是不断革新发展的，由此开辟出来新的媒介空间也在不断更替转换，形成的媒介观念也在不断递进更新。因此，村庄的媒介空间以及村民媒介观念等一系列变化，以及背后社会关系的流动就成为本研究力图揭示的核心问题。

将乡村媒介空间的转型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乡村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既可以展现一定空间中的媒介实践，也可以揭示媒介实践建构的空间样貌。而且还能从乡村媒介空间变迁的历史

进程中，廓清空间与媒介相互作用的变化轨迹。需要说明的是，研究中所谈的媒介空间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并非是抽象的哲学概念，研究主要是想回答乡村媒介空间转型如何改变了人这一根本问题。因此，在后面章节的陈述中，对媒介空间的深描和阐释交织着由被动“人”向主动“人”转变的主线，渗透着对人主体性的发掘。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with 村庄选择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乡村文化生活可以通过描述媒介、空间、人这三方要素及其内在关联来展现。由于本研究立足于乡村社会变迁，因此，免不了涉及历史资料文献，但对于一个小村庄而言，相关的历史资料记载本来就少，涉及村民日常生活的描述更少。关于这部分的事实材料只能通过村民的回忆获得，尽管一些事情时隔多年，有些细节或许会有遗忘缺失，但总体上能勾勒出村庄大体的历史变化，最关键的是潜藏在村民心中的一些细腻真挚的感受至今仍留存着，交谈中能明显感觉到不同的情绪变化和观念更迭。该部分着眼于个人的体验，突出人的主体性，通过对村民在村庙、村校、家庭等空间中媒介活动的描述来窥探媒介空间与人的互动关系。在涉及当下情况时，主要借助田野调查，重点放在对“舞市”、家庙、祠堂、村庙等公共媒介空间的考察上。由于研究者本人是当地人，不存在文化上的交流障碍，也容易产生相通的理解与体验。正如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中谈到的Hollan关于个人中心民族志的三类研究方法，即“强调个人主观经验

的叙述、就研究对象的行为以及利害关系进行的参与观察，以及对深藏不露的生活体验所作的类似于将心比心式的诠释”。<sup>1</sup> 因此，在实际的调查中，我着重注意了以上三个方面。

为了能将当地乡村媒介空间的历史变迁呈现出来，本研究结合被调查村庄社会形态的历史变化，首先确定了一个历史与逻辑的起点，即传统乡村社会，并对其进行了界定，大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水岭，之前为传统社会，之后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都在此基础上展开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貌。尽管这种粗略的划分不见得能准确涵盖传统与现代的所有意涵，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乡村社会结构、公共文化、制度体系、媒介系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集体化时代开始以后，国家媒介体系的延伸、人民文化的推广以及乡村社会结构的改造三者相配合带来了乡村社会的巨大变革。这样划分的好处是便于进行历史比照，便于构建研究的逻辑体系。为了能以点带面，映射出乡村媒介空间转型的历史轨迹，本研究着重选取了每个历史阶段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媒介空间，如村庙、村校、“舞市”等，通过对这些空间中媒介及其传播活动的考察，分析其如何组织和构建媒介空间，同时关注人在媒介空间中的观念、行为以及相互关系的变化。这部分主要是通过访谈相关人员，如村庙会长、村校的公办和民办教师、广场舞队的创办者和队员等。需要说明的是，乡村媒介空间的转型与乡村公共文化的兴衰紧密交织在一起。乡村媒介空间的转型可以通过乡村公共文化的变革得以说明，乡村公共文化的兴衰变化也可以通过乡村媒介空间的转型得到阐释。此外，乡村家庭媒介空间看似与乡村公

---

1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1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共文化变革无太大关联，但家庭媒介空间的成长发展却是从另一角度映射乡村公共文化发展兴衰的有力证据。20世纪80年代初，原有的以村校为中心的乡村公共媒介空间日渐式微，家庭媒介空间发展成为村民文化生活的主要领地。通过家庭媒介空间中新的媒介技术分工，年轻人掌握了媒介主导权，并在后来不断发展的个体化媒介实践中完成了个人的崛起，家庭成员走出家门在开放的社会空间和新的文化意义体系中聚合为“小圈子”，多元的“圈子文化”和社群媒介空间逐渐形成。其间虽然伴随着乡村对传统公共文化复兴的努力，但受市场、媒介技术等力量的影响，乡村公共媒介空间的重新构建异常曲折。因此，本研究在乡村媒介空间的多种表现形态中跳跃，试图展示日常化的媒介实践，这样做尽管看似有一些迂回，但乡村媒介空间转型主线是一以贯之的。

按照史学界的主要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当代史的起点。本研究主要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乡村媒介空间转型的历史脉络，探讨乡村媒介空间转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探寻乡村媒介空间演变的内在规律，因此本研究所涉及的历史阶段应属于当代史范畴，重点是当代乡村媒介空间转型。但对于乡村媒介空间转型的历史进程而言，这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不断发展的历史连续体，其中包括持续发展变化的传播关系结构、意义体系以及思想观念体系。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中涉及的传统乡村社会的相关情况只是作为当代乡村媒介空间转型的比照和逻辑起点，以考察当代乡村媒介空间的变与不变。

正如费孝通先生在谈到为何将江村作为研究对象时所指出的，尽管中国各地农村均有差异，江村并不能代表其他中国农村，“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也不能解释其他农村，但这种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比较，如果我们

用比较方法将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那么不需要将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地加以观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了。”<sup>1</sup> 因此，本研究以一个普通的中国西北村庄作为研究对象，现实的考虑是通过对该村庄的考察，参考其他乡村研究，达到对一个地区的了解，得出哪怕是区域性的结论。

本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淤泥水的社会变迁为样本，对乡村媒介空间转型着重从两方面展开探讨。一方面以空间建构为切入点，重点对乡村媒介空间的形变进行考察；另一方面以关系生产为切入点，重点对乡村媒介实践进行考察。通过对媒介空间中传播网络和传播关系的交叉考察来揭示媒介与乡村社会间的深层互动关系。本书的具体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引言。主要说明了研究缘起、研究现状、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其中着重从国内国外的相关研究现状出发，梳理此类研究的路径以及主要研究的问题，并由此引出本研究的问题与思路。其中也对研究方法和材料收集情况做了交代，对村庄选取的意义和价值做了说明。

第二章，理解媒介空间。主要围绕对媒介空间的认知与理解，先从社会学与传播学两个角度讨论空间与媒介的具体内涵。进而探寻空间与媒介的内在关联，提出媒介空间的定义。立足媒介空间意涵，安排研究路径，一方面从纵向的传播场景变化把握乡村媒介空间的历史演变，另一方面从横向的传播关系变化审视乡村媒介实践，揭示媒介与乡村社会的深层互动。

---

1 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个人的经历》，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15～1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三章，乡村媒介空间的传统与日常。关于传统社会的认识有不同的说法，本研究结合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界定以及淤泥水的村史，将传统乡村社会与现代乡村社会的分水岭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本章着重从媒介空间的视角对淤泥水的传统乡村社会生活图景进行全景扫描，就内化于日常生活空间之中的传播媒介形态及村民的社会交往活动进行考察并对传统乡村媒介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进行了探究。

第四章，村庙：乡村公共媒介空间的记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淤泥水，村庙是传统乡村社会主要的公共媒介空间。本章着重对村庙的空间文化进行探究，对其中的传播场景和传播关系进行分析，对村庙这一公共媒介空间共同体意识的生产和集体记忆的传承进行探究，揭示了传统乡村社会中相对稳定的媒介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内在机理。

第五章，村校：乡村公共媒介空间的结构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力量深入乡村社会，通过现代媒介的植入对传统乡村公共媒介空间进行了国家化改造，以村庙为代表的乡村公共媒介空间快速衰落。村校取代村庙成为新的乡村公共媒介空间。本章就这一历史过程进行梳理，探讨国家力量如何借助现代媒介网络和村校完成对乡村公共媒介空间的改造。在此过程中，村民们经历了现代媒介启蒙，形成了现代媒介观念。

第六章，家庭媒介空间的分离与崛起。随着乡村集体化生产生活方式向家庭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现代媒介开始脱离公共领域，走向乡村家庭，以村校为中心的乡村公共媒介空间逐渐走向衰落，家庭成为组织村民媒介生活的主要空间。继收音机、电视之后出现的录像机、VCD、

DVD、卫星天线等媒介，都在不断强化着家庭媒介空间。现代媒介也在此过程中促成了家庭媒介空间的结构、伦理等方面的变化。本章着重对乡村家庭媒介空间的变革以及家庭成员传播关系的变化进行探究，揭示村民的媒介私人化观念如何形成。

第七章，改革开放后村民自觉的媒介空间再生产。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乡村民间信仰活动升温，以村庙、家庙为代表的传统公共媒介空间逐渐恢复，以“舞市”为代表的公共媒介空间逐渐形成并兴起。由此掀开了自觉的乡村媒介空间再生产序幕。本章着重以“舞市”和村庙重建为切入点，探讨在村民作为主体在开放的社会交往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村民如何借助媒介空间的再生产拓展外部社会交往。

第八章，技术催动下的乡村媒介空间再生产。淤泥水的媒介系统经历了由文化偏向到技术偏向的历史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媒介空间生产方式以及对村民生活交往方式的塑造上。本章着重就技术媒介在乡村社会的空间化实践进行详细论述，就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

第九章，乡村振兴与乡村媒介空间生产的制度转型。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乡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农村社区逐渐萎缩，另一方面乡村媒介文化的低俗化等问题开始显现。国家重建乡村公共媒介空间的努力遭遇挫折。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成为重建乡村公共媒介空间的历史机遇，为此，本章在梳理问题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着重对新时代乡村媒介空间生产秩序的转向和以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为中心的乡村媒介空间再生产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第十章，乡村媒介空间转型的反思。从淤泥水公共媒介空间转型的历史过程出发，尝试对媒介空间的生产机制进行总结，即空间的媒介化

与媒介的空间化；通过深入剖析乡村媒介空间转型揭示出人主体性的形成与发展，解读和理解乡村的媒介启蒙；重新回归媒介空间的意涵，结合对乡村媒介空间转型的历史考察，总结梳理乡村媒介空间的转型规律并探讨乡村媒介空间生产中存在的问题。